

鲁迅
《故事新编》
研究及其他

Luxun
Gushixinbian
Yanjiu&Qita
吴颖 吴二持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吴颖 吴二持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 6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81036-868-0

I. 鲁... II. ①吴... ②吴... III. 鲁迅小说-文学研究-文集 IV.
I210.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735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

作者: 吴颖 吴二持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叶思源

封面设计: 郭炜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168 1/16

印张: 19.5

字数: 224 千字

版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ISBN 7-81036-868-0/I·157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

吴颖 吴二持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总序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肌体，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游离于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就像游离于肌体的灵魂，无法为大学教育注入新的生命，也无法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而脱离科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则像没有灵魂的肌体，缺乏新鲜的生命，缺乏创造的活力，只能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吃别人嚼过的馍，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教师感觉不到创造的乐趣，学生也得不到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根，它扎在地下；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抽出的叶、开出的花，它长在树冠、开在枝头。根深蒂固才能叶茂花盛，叶茂花盛才看得出它的根深蒂固。

所以，一所大学不能忽视平时的课堂教学，但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科学研究。

我们汕头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正因为年轻，才应当有活力，有朝气。向外，我们应当向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向内，我们则应当充分开发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尽快出成果，尽多出成果。学术重积累，但更重创造。只有勇于创造，才能有所积累，才能迅速积累。我们除拥有国内其它大学共同具有的有利条件，还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人面前亦步亦趋地爬行，我们应当发展得更快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的，准备每年出版10~20种，凡是汕头大学教师的科研学术著作（暂时仅限于文科各系），都在资助出版之列。它是我们汕头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参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希望汕头大学文科各系的教师更加焕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热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撰写更多更好的科研学术著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目 录

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	4
再论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	20
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32
《故事新编》研究诸问题的第四次商略	45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心态及其对作品的自评	72
重评几十年来《故事新编》论争双方的主要论点	82
《故事新编》与历史文学的美学机制	95
谈《故事新编》里的几个形象	109
人类初始的辉煌	115
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	131
《铸剑》新论	142
毛泽东论鲁迅与当代鲁学研究	157
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173
略谈鲁迅文评的风格	197
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几个主要论点	202
评关于鲁迅杂文的几个流行观念	222
一本抄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印刷品	236
关于“世界人”	242
“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火把	257
鲁迅早期思想与易卜生	269
鲁迅与胡适比较谈	279
鲁迅早期思想之一斑	285
附录：吴颖、吴二持论要论著目录	296
后 记	309

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

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这问题，一直就流行着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解答。

还在鲁迅自己活着的时候，他就曾在关于他的《故事新编》和别的小说的评价问题上，针对着“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从而说明他的《故事新编》和别的小说所依据的是典型化的创作方法。1933年，鲁迅在谈到《不周山》（即《补天》）和别的小说的创作方法时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①这和《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意见是一致的。1936年，他在给徐懋庸的信中谈到《出关》时说：“……看见先生的文章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枝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

^①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关》封闭了。”^① 这一看法，他还有发挥：“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这和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霁，《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霁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②

以上所引的几段话，都是大家熟知的；所述的道理，也是明明白白的。然而解放后，不少《故事新编》的评论家却有意无意的漠视这些大家熟知的道理。当然，评论家们都想竭力去阐明和肯定《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有些同志（例如下文要谈到的伊凡同志）还想去廓清杨绍萱同志的反历史主义理论和雪苇的错误理论对《故事新编》的不同程度的歪曲；这样的动机无疑都是好的。可是，由于评论家们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并没有越出庸俗社会学的范围，因而在有关《故事新编》的论述中，即使有着不同程度的正确成分，但基本倾向则是错误的。这些庸俗社会学的错误评论的共同特征是：忘记“典型是对生活作现实主义反映的基本条件”；拒绝承认鲁迅自己反复说明的典型化方法——“不是用公式，而是用鲜明的、具体感性的、给人以美感的形象来再现生活的本质方面”的方法——是《故事新编》的基本创作方法，硬说“隐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取一点历史上的‘因由’，从而达到对黑暗现实猛烈抨

① 《鲁迅书简》下册：致徐懋庸第43信。邱先生指邱韵铎。

②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击”是这部作品的基本创作方法，不着重去“判断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的品质和独特性”，而是着重去评论作品中某些用杂文手法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并且认为这些细节的意义就是作品的基本的意义。^①

最先流露出这种看法，也就是最先把《故事新编》断定为“寓言式的短篇小说”的，是冯雪峰同志^②。尽管他在谈到《故事新编》时只有含糊的几句，但由于雪峰同志在研究鲁迅上的优异成绩（这是大家公认的）所造成的权威地位，所以即使是含糊的几句也分明起着为错误理论开路的作用；连认为《故事新编》不是鲁迅的“重要作品”、“代表作品”的错误见解^③也一再得到传播^④。但雪峰同志谈的毕竟还是含糊的几句；而确实根据“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一类基本论点，较先对《故事新编》作出比较系统、全面的论断的，是伊凡同志的《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在这篇文章中，伊凡同志完全抹杀了艺术的特征，机械地作出这样的政治结论：“鲁迅先生原就不想去写什么‘古人’。他，只是假借‘历史小说’的‘形式’，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的压迫下，向黑暗势力举起自己的投枪而已。”伊凡同志甚至断言：这些作品“很明显地不是‘历史小

① 本节中关于典型的引文，均见《文艺报》1956年3号，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关于“借他人酒杯……”等引文见《文艺报》、《长江文艺》、《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文章。

② 《文艺报》1952年17号26页，《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下）》。

③ 雪峰同志说鲁迅的《非攻》、《理水》、《出关》等五编作品“不是他后期的重要作品”，“不应当看作他的代表作品”；这正是把这些作品断定为“寓言式的短篇小说”之后必然有的贬低作品的意义的错误判断。自然，鲁迅后期的历史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总和，比不上他后期的杂文；前期也是如此。但这主要是因为历史环境和战斗任务要求他以杂文为主要战斗武器的缘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故事新编》是一部最先出现的、成就最高的历史小说集；从鲁迅的创作的角度来看，《故事新编》代表他一个方面的创作。因此，正如杂文中、小说中的最好的作品是他的“重要作品”、“代表作品”一样，《故事新编》中的《非攻》、《铸剑》等最好的作品，也完全有足够的资格说是他的“重要作品”、“代表作品”的。把不同数量、不同样式的作品拿来作不科学的类比，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不科学的。

④ 李桑牧同志和刘绶松同志就都跟着雪峰同志，断定《故事新编》中的作品“不能算是他后期的如何重要的作品”，“同他的那些杂文比起来，不能算是他后期重要的作品”。见《长江文艺》1954年5月号、《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276~278页。

说’”，而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①。伊凡同志的这些错误见解，由于穿着一个肯定《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的外套，因而更容易迷惑人，实际上也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又如李桑牧同志的《卓越的讽刺文学——《故事新编》^②的基本论点和主要论断，就大都是继承着伊凡同志的错误意见的；当然，有些地方也是继承着雪峰同志的错误意见的。丁易同志和刘绶松同志也对《故事新编》有所论述；丁易同志的论述^③还有更多一些的正确、有价值的部分，但基本论点也是继承着伊凡同志、雪峰同志的错误的；而刘绶松同志的论述^④，则几乎全部都是承袭着伊凡同志、雪峰同志的错误。这就是有关《故事新编》的庸俗社会学的评论的基本情况。

这里面，给评论家们——特别是给伊凡同志和李桑牧同志搞得最为混乱的，是关于《故事新编》中某些直接抨击现实的“隐喻”的细节的理解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基本搞清楚这些评论的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实质；所以，这里就集中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能否认，《故事新编》确有一些用杂文手法处理的“隐喻”的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油滑之处”，如《补天》中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奔月》中的“剪径的玩艺儿”、“思想的堕落”，《理水》中文化山上禹的有无等议论和“OK”、“法律解决”、“维他命 W”、“莎士比亚”，《采薇》中的“海派会剥猪猡”、“为艺术而艺术”，《出关》中的“老作家”、“新作家”、“来骂话啥西”，《非攻》中的“募捐救国队”等。这些，鲁迅曾有过说明：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

① 《文艺报》1953年14号。

② 《长江文艺》1954年5月号。

③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4~197页。

④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276~278页。

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只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①——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②

不过这样的写法 [作者注：指典型化的创作方法，见上文]，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③

这些，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伊凡同志说：“这个‘止不住’，正生动地告诉了作者的作为一个战斗者的良心。”李桑牧同志也说是“表明了一个战斗者念念不忘于对现实进行战斗的心情”。就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伊凡同志和李桑牧同志对《故事新编》的各个作品作了一系列的论断：《非攻》是“巧妙地穿插着对现实的直接抨

① 即胡梦华，详见《热风》中《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

② 《故事新编·序言》。本文所引《故事新编》的正文或《序言》的文字，不再一一注明；所引伊凡同志和李桑牧同志文章中的文字，见《文艺报》1953年14号、《长江文艺》1954年5月号，也不再一一注明。

③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击”，“更重要的”是“讽刺着现实中的那些‘民气论者’”；《理水》的“基本主题是：攻击国民党匪帮统治时期的官吏的腐败和专横，官场学者的卑劣面貌，从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彻底腐朽”；《采薇》是“对现实中的盲目的正统观念者予以嘲笑”，并揭露“当时那些自命清高”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士们”；《起死》是“对那些自命超现实，超利害的‘第三种人’作了尖锐的讽刺”；“《出关》中就仍有对于当时那班洋场上的市侩文人们的鞭挞”，“还活画了那些借此发财的‘文化商人’的无耻嘴脸”；《补天》是对于“卫道者”，对于“为统治者的罪恶作辩护的‘正人君子’们”的“强烈的讽刺”；《奔月》是“一方面揭露那些宵小的面目，一方面也有作者自己寂寞的心情的流露”，连伊凡同志和李桑牧同志一致认为“接近于‘历史作品’”的《铸剑》，也“还巧妙地穿插着对现实中的那些伏在统治者脚下讨生活的小市民的庸俗性的直接抨击”。总之，都是“针对现实”的“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的杂文”、“寓言似的讽刺作品”。这其实就是在那些“油滑之处”中兜圈子，捉迷藏，一直就没有越出鲁迅所批评过的“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范围。

本来，把这个“止不住”理解为“正生动地告白了作者的作为一个战斗者的良心”，如果是说明鲁迅在特殊的战斗环境中对现实斗争的关心，那是对的。但如果把这作为《故事新编》的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创作方法的基本论据，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是说，只有“油滑”，——例如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一个小人物之类——作者才有“战斗者的良心”，如果按照原来计划“很认真的”写下去，就是没有“战斗者的良心”；也就是说，杂文家、寓言家的鲁迅就有“战斗者的良心”，而历史小说家的鲁迅就没有“战斗者的良心”，他的写历史小说，简直是在做“亏心事”了。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对这些“油滑之处”，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这些“油滑之处”，以上两段引文已说得极清楚：作为一种方法，不过是搀杂在典

型化的方法中的偶一为之的杂文手法；而作为一种构成因素，也不过是作品中的非常次要的方面和非常个别的部分。鲁迅虽然说过《故事新编》是“游戏之作居多”^①一类话，但那是自谦之辞。在《序言》中，他很准确地肯定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是“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也就是说，能创造了有生命的艺术形象；但也有缺点：“时有油滑之处”；既然只是“时有”和只有“之处”而已，可见并非全部或主要是“油滑”。第二，这些“油滑之处”，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②因此，鲁迅就抑制着创作的欲望，以杂文作为他的主要的战斗武器，而且运用得非常熟练，以至成了习惯。而当他在创作历史小说时，由于类似以上两段引文所述的客观原因，就使他搀进一些用杂文的手法处理的“隐喻”的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了。非常显明，这并不是作者的过错。第三，这些“油滑之处”本身，在当时是起过一定的战斗作用的。鲁迅自己曾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③这些战斗作用，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这只是作品的附带的次要的作用，决不是基本的主要的作用。大家知道，《离骚》的美人香草之喻是有意义的，但决不能说《离骚》的主要意义仅仅在于美人香草之喻这类细节上；这是明明白白的。第四，这些“油滑之处”，从典型化的角度来看固然是缺点，但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其中一部分，还是基本符合作品中生活逻辑的要求的。如《奔月》中逢蒙的“剪径”，《理水》中禹的有无的讨论，《非攻》中的“募捐”等，就是

① 《鲁迅书简》下册：致杨霁云第33信。

② 瞿秋白《乱弹·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③ 《鲁迅书简》上册：致黎烈文第28信。

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故事新编》，就是其中之一^①。在《序言》中，他说“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而《不周山》便是“很认真的”“动手试作的第一篇”。他又说“历史小说”有两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是一种，“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也就是以塑造艺术形象为中心任务的，又是一种，而《故事新编》，“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那自然是后一种。他还说这部作品“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可见《故事新编》确是“创作”的“短篇小说”，是写“古人”的“历史小说”。

这里有一个问题：像鲁迅自己那样，把《故事新编》看成是写“古人”的“历史小说”是否就贬低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包括现实意义）呢？我们的答复是“否”。自然，写现实的题材对读者是有更直接的意义的；但艺术作品的思想意义主要是决定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态度和艺术地描写生活的能力，而不是决定于题材。鲁迅曾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② 鲁迅的《呐喊》、《彷徨》中写现实的小说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但《故事新编》中的写“古人”的小说，也同样是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的。

这里，我们还不打算对《故事新编》中全部作品的思想意义进行评论。因为，当我们以作品的艺术形象作中心进行分析时，不但要联系到作品的故事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依据，而且还要联系到作品产生时作者的客观环境、战斗任务和作者的思想情况；而这些作品不但产生于不同时间，而且又描写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

①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② 《而已集·革命文学》。

因此，全面的评论需要很多篇幅。但为了避免空言无补，所以准备针对《理水》、《非攻》和《铸剑》这三篇作品的主要艺术形象综合地提出一点简单的理解，算是我们对《故事新编》的作品的简论举例。

《理水》作于1985年11月，《非攻》作于1934年8月，这正是红军北上抗日和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同意丁易同志对这两篇作品的创作动机的分析，“这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对于鲁迅当然是极大的鼓舞，必然激动他要写下一些什么，然而他又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于是只好抱着敬仰的心情写下两个伟大的忠心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人物，来抒写自己的欢乐了。”^①同时，关于禹的治水和墨子非攻的传说的或历史的记载，本来就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充满着人民性的因素。因此，鲁迅选择了这样的题材来创作历史小说，是有明显的战斗的现实意义的。

《理水》用了不少的篇幅概括地刻划了一批反动、颟顸、昏愤、顽固的“大员”和叭儿式的“学者”的无耻嘴脸，深刻地、严厉地揭露他们的丑恶、残忍、卑劣、庸俗、无聊的精神状态。这些揭露，虽然若干地方和作品中用杂文手法处理的“隐喻”的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联系在一起，但作者塑造的群像中所显示的社会生活内容，实际上比那些细节所接触到的现实现象要深广得多。出现在文化山上和水利局里的一批“大员”和“学者”，决不仅是具备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大员”和“学者”的特征，而且也具备别的时代剥削阶级的某些“大员”和“学者”的特征。这些自然是《理水》的思想意义的构成部分，但其实还不是主要部分；从艺术结构上说，这些不过是作为禹的形象的对立物而出现；禹的形象，禹和各方面人物的关系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思想。作者着重刻划了禹这一人物在特定环境下和各方面的关系中的思想和性格的特点。他真正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为了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6页。

治水，他“讨过老婆，四天就走”；在工作时“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在治水时，他处处能倾听“百姓的意见”并注重调查研究“查了山泽的情形”，“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便一直是不可动摇地坚持下去，坚决反对“家法”、“父之道”、“老大人的成法”的“湮”，反对各种各样的庸俗陈腐的见解和阻碍力量，也不管别人把“导”诬蔑为“蚩尤的法子”。他充满着鞠躬尽瘁、苦干到底的实践精神，关心人民疾苦，正如他自己在回答舜的询问时所说：“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我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益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搬家。大家这才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就这样，他领导“疏通了九河”，“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可以说，在《理水》中，作者塑造了禹这一个充满着中国人民的品质特征的艺术形象，并以作者的最真挚的内心态度显示着对这一人物的热爱和崇敬。

以墨子为中心人物的《非攻》，在精神上、在思想上和《理水》是一致的。墨家是以禹的为人民谋幸福的苦干到底的实践精神为榜样，自觉地师承着禹的。据《庄子》的记载，历史上的墨子曾经这样地说明墨家的思想渊源：“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王先谦注引俞云：山，当作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什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跋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① 这就是很好的说明。《淮南子》

① 《庄子》杂编：《天下》。

有这样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① 道家的《庄子》认为墨家“其行则非”，认为墨家是“乱之上也，治之下也”；但也肯定墨家：“虽枯槁不舍。”^② 激烈地攻击墨家，说什么“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儒家的孟轲也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③ 这些正是墨家的基本精神。而鲁迅的《非攻》，就是通过艺术力量，复活了最充分地体现着这种精神的墨家最杰出的代表者墨子的形象。出现在《非攻》中的墨子是一个主张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抑强扶弱的人道主义战士。他反对强盛的楚国无缘无故地去进攻凋敝的宋国，但他并不是对楚、宋有什么偏见；当楚国放弃进攻计划时，他也想带他著的书给楚国人看。这就可以看出他非攻的思想基础：兼爱。兼爱——非攻，就是这一人物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他的“于民有利”的“行为”，就是从这一出发点引伸出来的衡量一切行为的准则。这样的思想、观点贯串在他的全部行为中。他整个浸透着言行一致的实践精神；为了“行义”，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他没有经过委派就代表着宋国人民，千辛万苦，跋涉奔波，跑到楚国去办外交。他办外交，并不“只望着口舌的成功”，而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虽然他是胜利了，我们没有看到他怎样帮助宋国抵抗楚国；但显然，如果外交办不成，他将会毫不踌躇地去担任一个出色的指挥员，来实践他的行为的目的的。他不但有刻苦耐劳的精神，而且有坚持到底甚至“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勇敢精神。他认为是义所当为的事，就坚持到底，贯彻始终，虽有生命危险，也不能使他有分毫动摇或使他有丝毫让步。当公输般由于试行攻守都失败，起了杀机时，警惕性很高的墨子知道了，但他毫不害怕，

① 《淮南子》卷20：《泰族训》。
 ② 《庄子》：杂编：《天下》。
 ③ 《孟子》：《滕文公》、《尽心》。